

院藏元明時期所造準提咒梵文鏡

劉國威

本文主要探討院藏一面純為梵字的銅鏡。經解讀，此鏡是以梵文蘭察體所鑄寫的佛教咒語，內容包含準提咒、淨法界真言、文殊一字咒、以及六字大明咒。準提咒雖於隋唐年間即已傳譯，但如此咒語的組合是來自遼代僧人道殿所著《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的影響，明清以來漢傳佛教關於準提咒的修持提倡也都與此書相關。此鏡所鑄梵字雖是蘭察體，依字形風格研判，非由藏人書寫，應約是明代於漢地所造。



在本院院藏銅鏡中，有兩面與佛教內容有關，不是因為上有佛教造像，而是其鏡面周延鑄有梵文字體，一般人雖不識梵字，但合理推測是佛教梵文咒語。其中一面銅鏡（圖一）是漢梵文相雜：中央為一「佛」字，內圈週繞漢字咒語，字跡從十二點鐘

方位順時針依序為：「南無颯哆喃三藐三菩馱俱胝喃怛你也他唵折隸主隸准提娑婆訶部林」，共二十九字（其中「你也」、「娑婆」、「部林」為上下合寫，表二合音，故為二十六音），此即流傳甚廣的準提菩薩咒。準提咒從「南無」至「娑婆訶」為

止，「部林」（bhūṃ）是所謂的「大輪一字咒」，也常習慣加在準提咒後，這是來自遼代五台山金河寺僧人道殿所著《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的影響。沿鏡緣外圈則另繞一周梵文咒字，亦是自十二點鐘方位順時針依序排列，共計二十六字，每字位置基



元~明 準提咒梵文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元~明 準提咒梵文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推測。國立歷史博物館亦藏一面同款銅鏡（登錄號〇九八二五）（註二），邊緣些許破損，未穿繩，名為「宋式梵文鏡」，登錄年代為金代，但未敘明判定理由。

鏡面梵字解析

此鏡鏡面所鑄梵字亦明顯屬於蘭察體，此類梵文字體源自北印度的婆羅米字體（Brahmī），發展於十一世紀後，由北印度與尼泊爾傳至西藏，



圖一 漢梵兩體準提咒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本上完全對應內圈的漢字咒語，字形為蘭察體（Ranjana script，西藏轉音稱為lanydza），是該準提咒的梵語拃寫：「na mo sa pia nān sam ya ksam bu ddha ko tī nām ta dya thā om ca le cu le cun de svā hā bhūm」。〔註一〕院藏另一面銅鏡（圖二）則是中央、內圈、外圈皆為梵文咒字，由於過去未曾對此面梵字咒鏡加以分析，故本文主要針對此鏡加以探討。

此銅鏡直徑約九·一公分，厚約〇·五公分，約是可持於掌中之大小；鏡面中央有一梵字，周圍較為浮凸，側邊鑿對通小孔，穿有黃繩；未鑄梵字的另一面則平滑無飾。此形式之梵文咒鏡並非罕見，多處典藏單位均有類似藏品，大陸一些古物拍賣網站亦可見，然品況材質不一，有的看來銅質較新，且咒字字跡雖同但粗細明顯有別，非同時期鑄造；有的則看來較古舊：如周邊缺角、或部分咒字磨損不清，保存狀況較差。雖大部皆稱此鏡為「準提咒鏡」，但未見說明理由，也未對鏡上咒字解析；其年代判定則從元到清都有，看來都是主觀

今日尼泊爾仍使用此字體，西藏受此字形傳統影響，至今書寫梵文亦習用此體，如西藏寺院門楣上所書咒語皆屬此形。元代因蒙古人信仰藏傳佛教之故，該字形透過藏僧傳至內地，元明清三朝有關梵字之書寫幾乎皆屬此體，如元代浮刻於居庸關之梵咒、明成祖於北京所造「永樂大鐘」上之梵咒、明清年間內府所造書有梵咒之瓷器，乃至明《永樂北藏》、清《龍藏》等內含梵字咒語之部分悉以蘭查體書寫表現。

北宋時期習慣使用城體（Nagari script）梵字書寫咒語，該字體於八至十世紀時期流行於中印度與東印度，隨印僧傳來中國，與北宋屬同時期的遼、金、西夏、大理亦受同一影響而習用此字體，舉例而言：《房山石經》中，於遼代所刻的《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其所配刻梵字是城體；金熙宗皇統年間（一一四一—一一四九）所編刻的《金藏》，收有一部北宋初由印僧法護與漢僧惟淨合編的《景祐天竺字源》，其中所教授內容即為城體梵字；本院院藏珍品——大理國畫師張勝溫的《梵像卷》

（約於一一八〇年左右完成），其中書寫有梵字「多心寶幢」（內容即梵文《心經》）與「護國寶幢」兩幅，其字體亦是典型城體。因此，從梵文字體在中土流行的時代背景看來，歷史博物館判定此鏡為金代作品應無可能，因為蘭查體傳至中原漢地絕不早於元代。

此鏡中央的梵字是「唵」（om）字。外圈為二十個梵字，從十二點鐘方位，依逆時針方向排列，依序是：「na mo sa pia nān sam ya ksam bu ddha ko tī nām ta dya thā om ca le cu」。可以看出出來外圈是標準的準提咒，但未完，而是跳接至內圈，內圈共十六梵字，一樣是從十二點鐘方位依逆時針方向排列：「le cu nde svā hā bhūm om ran om tīm (hrīm?) om na ni pa dne hūm」。om ran傳統稱為「淨法界真言」；om cchrim是所謂的「文殊一字咒」，但此處字體較似寫為trim或hrim；而om mani padme hūm較為人知，即著名的「六字大明咒」。將準提咒和「大輪一字咒」、「淨法界真言」、「文殊一字咒」、「六字大明咒」合誦，此傳統亦是遼



圖三 《重刻准提神咒持誦法要》

代道殿《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所首倡。

鏡上梵字雖為蘭查體，但鑄寫字跡並不標準，如na寫似ga，ra寫似na等，部分子音連音字體初看亦難以辨識，並非尼泊爾或西藏傳習的蘭查體書法，反而具備漢地不懂梵字者臨摹傳抄的筆畫特徵，所以才會有不少誤寫或筆順不清處。另一特點是此鏡梵字排列形式相當獨特，咒字從外圈逆時針排列，未完盡之咒語則旋入內圈

鳳年間（六七六～六七九）來到中國，是由他首先譯出準提菩薩的經典——《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經》，但此譯本的修持儀軌尚不完整。直到唐玄宗時期，由開元三大士——善無畏（Subhakarasiṃha，六三七～七三五，七一六年至華）、金剛智（Vajrabodhi，六六九～七四一，七一九年至華）、不空（Amoghavajra，七〇五～七七四，七一九年隨其師金剛智來華）分別傳譯相關經典，才傳出較完整的修持儀軌：善無畏譯出《七佛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法》和《七俱胝獨部法》；金剛智譯出的是《佛說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經》；不空所譯的是《七俱胝佛母所說准提陀羅尼經》。

在開元三大士的譯本中，善無畏的譯本較短也較獨特，其《七俱胝獨部法》中所謂「獨部」意指準提是「總攝二十五部大曼荼羅印」，然內文不長，未詳說灌頂受戒等事相，導致對欲修此法者是否需依密教一般

繼續排列，此種咒輪形式從未見於其他準提咒鏡，反而是西藏佛教的一些本尊長咒的咒輪排列有類似風格，但準提咒在藏傳佛教並非重要，且習慣上持誦的是短咒，不是這種來自《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的內容。明清以來流傳至今的準提梵字咒鏡，最常見的排列形式是沿鏡緣自十二點鐘方位順時針環繞一圈，如清末《重刻准提神咒持誦法要》書中所示鏡壇圖像，一面是漢字咒語，另一面是梵字（圖

傳統先經灌頂等儀式，後世有多種解釋。其關於「鏡壇」的敘述也是後世乃至今日有關準提咒鏡製作的最早依據，《七俱胝獨部法》中言：「佛言若求成就，先作壇法，不同諸部廣修供養，掘地作壇，香泥塗之所建立。但以一淨鏡未曾用者。於佛像前月十五日夜。隨力供養。燒安悉香及清淨水。先當靜心無所思惟。然後結印誦呪。呪鏡一百八遍。以囊匣盛鏡常持相隨。欲誦但將此鏡。置於面前結印誦呪。依鏡為壇即得成就。」

金剛智與不空基本上延續其體系的一貫譯法，在序分、正文之後有唵誦法（即儀軌）的說明，事相規定嚴謹；且如同其他密法修持，先需受戒灌頂。在關於鏡子的使用上，二譯本差異不大，金剛智譯本：「或於淨潔鏡面。以好花念誦一百八遍。散置鏡上使者即現鏡中。復以前法更取好花。散鏡面上即有善惡相現鏡中。」不空譯本：「又法取一明鏡置於壇中。先誦真言加持花一百八遍已。然後又誦真言。一遍一擲打鏡

三），依序是：「om raṇ om echrīm om na ni pa dne hūm na mo sa pra nām sam ya ksam bu ddha ko tī nām ta dya tha om ca le cu le cu nde svā ha」。五首咒語的內容雖大致相同，但先後次序與排列方向和前述咒鏡不同。此外，將「文殊一字咒」拚寫為echrīm，也較符合經典中關於此咒的一般傳統拼法。

準提菩薩信仰與其鏡壇

準提咒傳至漢傳佛教的時間頗早（註三），依現存漢文藏經文獻所見，推測至少在西元六世紀時於印度已有流傳：北周朝來華的闍那崛多（Jñānagupta，五二三～六〇〇）最早將此咒漢譯，在其所譯《種種雜咒經》中，錄有「七俱胝佛神咒」，此即準提咒；玄奘（六〇二～六六四）所譯的《咒五首》中，也收有名為「七俱胝佛咒」的準提咒；但他們僅音譯咒語，並未翻譯經典或儀軌。玄奘於印度留學時所認識的印僧地婆訶羅（Dīpankara，六一三～六八七）在玄奘圓寂後的唐高宗儀

面。於鏡面上即有文字現。說善惡事。」（註四）可以看出此版本並不似善無畏譯本強調「以囊匣盛鏡常持相隨」：依鏡為壇即得成就。」唐代所翻譯的其餘密教經典，雖也有取鏡為用的類似案例，但未有如《七俱胝獨部法》這般強調「依鏡為壇」，將鏡子視為壇城（mandala）使用。

唐代盛行的密教修持與咒語以觀音、佛頂尊勝等為主，從考古與文獻資料看來，準提信仰雖有流傳，但似未盛行：我們至今尚未發現屬唐代的準提菩薩造像或相關鏡壇。敦煌文獻中，僅下列幾部準提經典：法藏編號P.3916中兩部抄本——《佛說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羅尼念誦法門》（金剛智譯本的後半部）與地婆訶羅的《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經》英藏編號S.83的地婆訶羅本，以及北京藏編號北七六八九的《准提咒經》（金剛智本）；在唐代高僧傳記中，也僅見一位名為神暄的僧人是「誦七佛俱胝神咒昏曉不絕」。（《宋高僧傳》卷二十〈唐婺州金華山神暄傳〉）



圖四 1348年立於莫高窟的六體「六字大明」，其漢音即從藏文音譯而來

道殿的《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

近代許多研究已經指出，明清以來漢傳佛教對準提咒的重視其實並非直接來自唐代譯本，主要根據實來自遼代僧人道殿所著的《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這位僧人的生平在卷首的陳覺序文及卷末的性嘉後序中均有略提：法號道殿，字法幢，俗姓杜，雲中（今山西大同）人；幼習儒釋之學，出家後持戒謹嚴，精研內典。其思想如其書名，主張顯密圓通，由於遼代佛教最具影響力的就是華嚴與密教二支，所以其顯密圓通主要指的就是此二宗的調和。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大致成書於遼道宗大安（一〇八五—一〇九四）年間，書中屢引大康（一〇七五—一〇八四）年間寫成並刊刻流行的另一遼代名僧覺苑著作，其判教思想也繼承覺苑看法——以華嚴為顯教圓教、以諸部陀羅尼為密圓，又特以準提為心要，並引北宋法賢所譯《金剛頂大教王經》為證：「大教王經云七俱胝如來三身。讚說準提菩薩真言。能度一切賢聖。若人持誦。一切

所求悉得成就。不久證得大准提果。是知准提真言。密藏之中最為第一。是真言之母神呪之王。」但道殿立場與覺苑仍稍有不同，他認為顯圓、密圓彼此無高下之別，故其纂輯《心要集》的動機即是為平息二者間互相非難的爭論，建立圓通平等的顯密學說。

書中關於準提鏡壇的敘述基本參引善無畏譯本：「但以一新鏡未曾用者。於佛像前隨月十五日夜。面向東方置鏡坐前。隨力莊嚴諸供養具。燒安息香及淨水。然後結印在於心上。呪鏡一百八遍。以囊盛鏡常將隨身。每欲念誦但以鏡壇置於面前。結印誦呪。」於後道殿並強調此鏡壇修持之殊勝：「准提真言既總攝二十五部真言。准提鏡壇亦總攝二十五部壇法。謂二十五部中壇法。或用形像印法梵字等。各各不同。今准提鏡壇。總攝此一切諸壇法也。故准提經云。總攝二十五部大曼荼羅。梵語曼荼羅。此云壇也。是知鏡壇最尊最上。能滅一切魔障。能生一切功德。眼見身戴皆獲利樂。故昔人云。壇者生也。出生無盡功德故。壇者集也。無邊聖賢

集會之處。如方珠勺水出。圓鏡對日火生。磁石引針琥珀拾芥。尚有難測功用。況諸佛不思議壇法耶。今有寡見聞者迷於密教見用鏡壇竟生毀謗。然三世如來未有一佛不依壇法。而得成道度眾生也。幸廣見聞速改其謬。」但他在書中並未明說鏡壇如何製作。

我們並不確知準提信仰在遼代的流行情況如何，但從部分金石資料可證明在遼金時期，準提咒是有一定程度的流傳，如：《全遼文·卷十》〈崇聖院故花嚴法師刺血辦義經碑銘〉記載花嚴法師是：「日講花嚴、菩薩戒，准提密課。」同卷的〈寶勝寺僧玄照墳塔記〉記載此位僧人玄照的行持：「誦得觀音品般若經。梵行品大准提陀（陀）羅尼。滅罪陀尼。佛頂心陀羅尼。一字頂輪王陀羅尼等。」而明昌七年（一一九六）所立太平院石幢，上刻準提、熾盛光、延壽、破地獄、僧伽吒、滿願等咒語。（註五）近年發現金代禪僧義謙（一一二八—一二〇〇）的《謙公法師靈塔銘》，上亦刻有準提真言。（註六）

過去研究認為《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入藏始自元代松江府僧錄管主八（註七），於大德十年（一二三〇六）年在江蘇磧砂延聖寺負責補刻《磧砂藏》時，此後明代永樂《南藏》、《北藏》、《嘉興藏》及清代《龍藏》中均收入，因此產生至今不減的影響。《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是因收入藏經後方為人重視，但此書實於稍早的《普寧藏》即收入，此藏是元代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到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〇）期間，於杭州路餘杭縣南山的大普寧寺進行刻版，該寺屬元代白雲宗寺院。一九三三年重印《影印宋磧砂本大藏經》時，因此書失佚，以《普寧藏》版本補頁，致有此誤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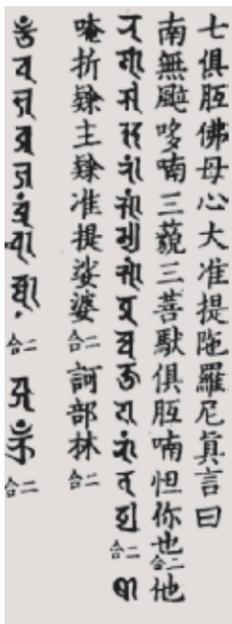
道殿在其書中除對準提咒的重視外，另一特點是對「六字大明咒」的重視，他說：「說此六字大明咒。有七十七俱胝佛。一時現前同聲說准提呪。即知此六字大明。與准提真言次第相須也。」（廣如大乘莊嚴寶

王經說）可知他對「六字大明咒」的重視是來自《大乘莊嚴寶王經》，此經是北宋印僧天息災於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譯出，相關段落是：「：聽是六字大明王陀羅尼口。唵摩拏鉢訥銘吽。：而於是時有七十七俱胝如來應正等覺皆來集會。彼諸如來同說陀羅尼口。曩莫颯鉢唵三藐訶三沒馱句致喃但備也他唵左肆租隸唵禰娑嚩賀。」經文中非唯強調「六字大明咒」，準提咒在此經中更是「七十七俱胝佛。一時現前同聲說准提呪」，此「七十七俱胝如來」所共說咒即是準提咒在北宋期的另一音譯本，由此可見道殿對準提咒的重視不僅是來自唐代開元三大士的文本，更是來自距其不到百年前的新譯經典。他在書中所使用的「六字大明咒」對音：「唵摩拏鉢訥銘吽」也就是《大乘莊嚴寶王經》的譯法，後世所造準提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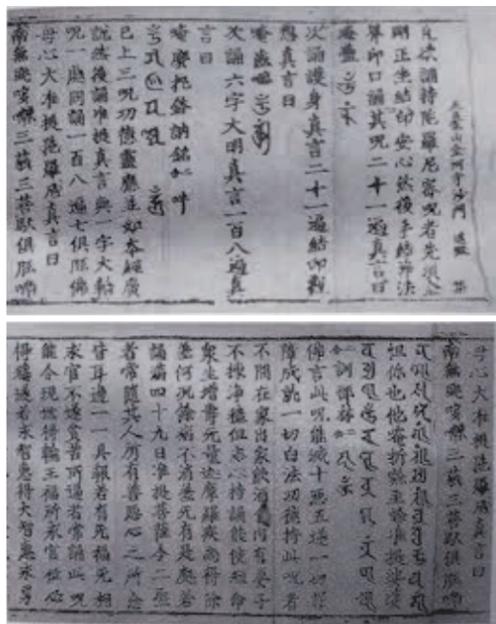
鏡因為是據該書所述，所以也用此音譯字，而非元代以來從藏區音譯而來的「唵嘛呢八彌（謎）吽」。（圖四）

道殿在書中箋註也提到：「又此準提。或名准泥或名尊那等。但是梵音不同耳。」這是因他讀過同樣由北宋法賢（即天息災）傳譯過來的《佛說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此四卷經其實是一大部頭的準提儀軌，道殿看來對此經相當熟悉，在書中也引用該經中龍樹菩薩所作讚頌：「尊那功德聚，寂靜心常持，一切諸大難，無能侵是人。天上及世間，受福如佛等，從茲如意寶，定獲無等等。」道殿僅將北宋譯法的「尊那」改為唐代以來習稱的「準提」。另一部提到準提咒的北宋密教經典也是由法賢翻譯的《佛說瑜伽大教王經》，道殿在書中也加以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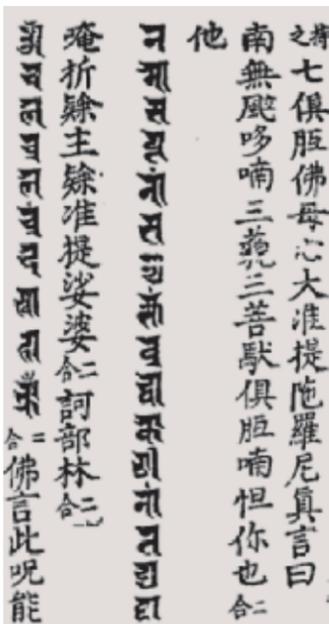
為何《大乘莊嚴寶王經》、《佛說持明藏瑜伽大教尊那菩薩大明成就儀軌經》、《佛說瑜伽大教王經》等北宋時期所翻譯的佛經雖收入藏，但在漢傳佛教歷史上幾無影響，過去學者已有討論，認為不外乎兩點：一、



圖五 普寧藏《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準提咒段落



圖六 俄藏TK270《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準提咒段落



圖七 永樂北藏《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的準提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龍藏》中該咒字與此銅鏡上同一咒字之對比

像，個人認為此類銅鏡雖亦本於道
殿傳統，由於他從未說鏡壇須加準提
像，較似後世發展。
最後附帶的一點觀察：在此主角
銅鏡上關於「文殊一字咒」的寫法相
當獨特，字形不易判定，像是 *lrim* 或
lrin，但絕非較常見的 *cohrin* 寫法，
是否為傳抄誤寫尚無法判斷；但該字
形和清《龍藏》所收《顯密圓通成
佛心要集》中「文殊一字咒」梵字極

北宋時中國佛教各宗派大致皆已成
形，自有傳統，已不再需要吸收來自
印度新譯經典的內涵。二、北宋所翻
譯的佛典大多與密教有關，這些內容
在教義與倫理上受到中國宗派的消極
排斥。(註八)但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
角度是：北宋時期的譯經院(九九一
年改名為傳法院)與唐代體制不同，
並非獨立機構，而是屬宋代外交機關
鴻臚寺下的分支(註九)，由於當時遼
與西夏均信仰佛教，常向宋請求頒贈
經典，故每有新譯經典傳出，即當外
交餽贈而傳至彼邦。因此，在遼金西
夏都頗重視密教的時空環境下，反而
是遼代僧人精通並引述此批傳譯自北
宋的密教經典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註十)

為何元代編藏時收入《顯密圓
通成佛心要集》，從現存黑水城文獻
的證據來看，此書應從遼流傳至西夏
等地，元時由於管主八等負責編藏的
僧錄官員皆有西夏背景，故此書收入
《普寧藏》與《磧砂藏》中。

近似(圖八)，目前尚未在比其更
早的《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版本中
找到其他近似字形案例。但若據此就
說院藏這面準提咒鏡是清代作品，我
認為理由尚不充分，從咒字排列形式
與書寫風格來看，此鏡和明清流傳的
大部分準提鏡有其差異，應有較早淵
源，個人認為其風格形制屬元明之際

不同年代的準提咒梵字

如前所述，現存準提咒鏡上的
梵字悉為蘭查體，此字體在元代方
透過藏區傳至內地。《顯密圓通成佛
心要集》的最早藏經版本是《普寧
藏》，其準提咒所用的是城體梵字
(圖五)；近年公布的俄藏黑水城文
獻TK270號，包含部分於西夏所刊印
的《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殘片(圖
六)，這可能是此書目前所知的最早
刻本，恰好殘片是準提咒這部分，也
清楚可見是用城體梵字書寫。《永樂
北藏》的版本則明白可見準提咒是以
蘭查體對寫。(圖七)這些證據可間
接證明《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中的
咒語在遼、西夏時期確實是以當時通
行的城體梵字轉寫，到元年間才改
用蘭查體，此點也印證該銅鏡絕不早
於元代的看法。

明清以來所通行的準提鏡另一
樣式是一面沿鏡緣為梵字咒，另一面
是咒語的漢字對音(同樣是《顯密圓
通成佛心要集》的咒語內容)，但鏡
中央則鑄有或正面或背面的準提菩薩

應無問題，但是否為後世依樣仿製，
應從銅質材料與鑄造技藝等角度加以
考量，此非我專長。本文僅從梵文字
形特徵與咒語內容的角度加以分析討
論，希望未來有人能提供更多參考證
據或其他角度的思考。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 註釋
1. 依正常梵文轉寫應為: *namo saptanāṃ saṃyak sambuddha koṭīṇāṃ tadyaḥa on caḥ cule cunde svāhā bhūmī*。此鏡蘭查體梵字大致無誤，僅 *sa mya ksaṃ* 的 *sa* 字似寫為 *ta*，*mya* 筆畫有缺，*ksaṃ* 字形亦有缺筆。此類準提鏡過去在漢地製作時，往往因工匠不懂梵字，依樣臨摹，致常生齟齬之異。似此梵字咒語的傳抄誤寫在漢文藏經文本中亦常見。
 2. 可參考 <http://collection.nmih.gov.tw/zh-tw/C/17/5/1/6/1177.htm>。
 3. 準提又音譯作準抵、准泥、准提。北宋時音譯為尊那，然此譯未通行，較受忽視。
 4. 更早的地婆訶羅譯本《佛說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羅尼經》，在這方面的論述幾同：「叉手捧華花，咒千八遍，散一鏡面；又於鏡前正觀，誦咒亦千八遍，得見佛菩薩像，應咒花百八遍，而散供養，隨請問法，無不決了。」
 5. 《金石粹編》卷一五七。
 6. 徐自強，《房山雲居寺謙公法師靈塔銘》，《文物》一九七九年一期。
 7. 一般認為他是西夏人。其附跋文云：「切
 8. Jan, Yun-hua. "Buddhist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and Sung China." *History of Religions* 6.1 (1966): pp. 24-42; 6.2 (1966): pp. 135-198.
 9. 見《宋史》志第一百一十八職官五：「鴻臚寺舊置判寺事一人，...其官屬十有二：...傳法院，掌譯經潤文。」
 10. Sen, Tansen. *Buddhism, Diplomacy, and Trade: The Realignment of Sino-Indian Relations, 600-14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nd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3. pp. 102-141.